

· 专家论坛 ·

中西医研究对象的比较

李致重*

关键词 中医; 西医; 研究对象

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形成多少门科学。所以在学科林立的知识体系中,研究对象代表着各个学科的本质属性,既是该学科的原始出发点,也是该学科成熟和发展中永久的立足点。中医的研究对象,及其与西医比较究竟有何不同,自然是人们认识中医学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1 《黄帝内经》时期人类主要的研究对象

《黄帝内经》之前人类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人类的感官系统所能感知的,称之为原生态的客观世界。那时候,反映在人类感官系统的,是原生态世界的运动、变化及其过程,即《周易》所说的“象”以及通常所说的状态、现象。从人们习惯讲的万事万物而言,那就是物之事或事物,而非物之质或物质。所以《黄帝内经》把人体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过程,称为事物表现的象、证、候,亦即通常所说的状态、现象或物之事。《黄帝内经》时期,人类制造器具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面对自身的研究也只能定位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的象,即证候这一层次了。

1.1 《黄帝内经》中的象与人体解剖 中医学讲的藏象,王冰作注时是这样说的:“藏(音 zang),藏(音 cang)于内。象,见于外,可阅者也。”由此可见,在内之藏(音 zang)是当年人们所见不到的,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其表现在外的象。先辈们是从外在的种种不同的象出发,在哲学的思维中逐步认识藏(音 cang)于内的藏(音 zang)的。因此中医学中的象与现代哲学中

的现象,含义相通。中医学里的证、候、态,也都是象的意思。

因为藏(音 zang)是藏(音 cang)于里而不可见于形,不可见于表的,所以《黄帝内经》把藏(音 zang)与象联结在一起,而称之为“藏象学说”。所以中医学里的“藏象”一词,应当理解为“藏之象”更为恰当。《灵枢·骨度》和《灵枢·肠胃》也记载了一些关于人的体表尺寸以及胃肠纳谷多少的内容,尽管当时从“剖割比干、斩杀翟义”那里也曾知道一些人体内脏的粗浅知识,但与西医学的人体解剖相比,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一角度上讲,“藏象”里的象是《黄帝内经》真正的研究对象,而藏(音 zang)只不过一个指意代词而已。当然,中医学的“藏象”也不应与当今流行的“脏器”之说相混淆。

1.2 西方的解剖 《黄帝内经》时期,古希腊在解剖方面应该是相对领先的,比同时期的《灵枢》的记载要丰富许多。古希腊有一位叫阿尔克莽的医生(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是胚胎学和解剖学的开创者,其解剖结论与《灵枢》涉及的人体内部结构的范围处于同一个水平。人们所熟悉的希波克拉底,是西方医学的鼻祖,其完整地观察过小鸡孵化的过程,第一次对人体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发现了人的心脏有两房两室。但从整体上看,其解剖结论与《素问》里所记载的,属于同一个层次。亚里士多德是西方非常有名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其著作《物理学》的姊妹篇《生物学》,专门研究了动物生殖、胚胎结构的问题。通过认真仔细的观察,全书在形而下的角度掌握了500种左右动物的资料,但是因受到肉眼观察方法的局限,使其未能在形而下的角度有所突破。

西医解剖学的长足发展,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17世纪,哈维在人体解剖上成功地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西医在解剖学上真正的大踏步发展,是在19世纪以后。而成功、广泛地将成熟的解剖知识

* 作者简介 李致重,男,教授,主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临床及教学研究。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原主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10年余。发表中医药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中医药专著12部。

• 作者单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4)

用于外科疾病的临床治疗,则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那时的粗浅解剖知识,严格地讲都不能算做医学解剖学。

《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秦汉之际,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中国著名医学家的全部认识和智慧。那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中国在形而上方面的研究,也已经趋于成熟。至于形下方面的研究,由于没有显微镜,解剖便做不好,所以对人体内部的认识,必然是极不完善的。

由此可以说,西方早期在人体解剖方面尽管略胜于中国,然而中国的中医学在形而上的研究方面已迈上了西方至今望尘莫及的成功之路。

2 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

笔者在长期中西医比较中多次提及,人类五千年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1];第一次高峰以研究事物的形上性特性为主,第二次高峰以研究事物的形下性特性为主。这里讨论中西医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也沿着这一思路来说明。

2.1 形上性的人与形下性的人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从形上与形下而言,人是形上与形下的两重性的人。

2.1.1 什么是形上性的人 第一,人是哲学的核心。人是天地万物之一,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中国古代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人就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西方也一样,亚里士多德及其老师柏拉图、苏格拉底,都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来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讲,人是什么呢?美国一位研究形上学的哲学家说过:古往今来从哲学角度给人做定义的,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给人做的定义是:“人是理性动物。”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即理性、动和物。人是有理性的,如果把人的理性去掉,人就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上帝给了人一个头脑,让人懂得理性思维,人既会观察,还会思考。动物这个词,还可以分为动与物两个方面。生物界里的物,与一般的物是不一样的,它是会动的物。这个会动的物,不是指一般的运动,而是指它自身的新陈代谢能力,或者中医上讲的自我修复能力。在“理性动物”这一定义里,既强调人的新陈代谢与自我修复的能力,更强调人的理性思维。而没有新陈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的物,没有理性思维的物,既不是动物,更不是人。

第二,“理性动物”的人是中医学研究的出发点。医学服务的对象固然都是人,然而,中医与西医两者的研究对象却不是同一层次的人。这是每一位中、西医工作者进入医学殿堂时,首先要澄清的重大学术问题。

按照《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医学家面对的人可以用“形上与形下两重性的人”来概括。中医所研究的人,是形上性的人。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形上性的人就是“原形”的人,即不打开人的整体前提之下自然呈现的“理性动物”的人。所以,中医并不关心构成整体的内在部分,不关心里边的肠子有多长,肾有多大。中医所关注的是活着的、有理性思维能力和新陈代谢能力的整体的人,即原形的人。

第三,《黄帝内经》视野里的人,即形上性的人或者“理性动物”的人。中医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形上的、原形的人呢?那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了。从《黄帝内经》时期到张仲景时期,中医通过四诊所得到的,统称为“证候”。如何准确理解“证候”这一概念的含义呢?证候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着的机体反应状态。这种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着的机体反应状态,就是中医的研究对象。因而,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或者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时期,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中国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就已经走向了成熟。

2.1.2 什么是形下性的人 西医学的产生,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得益于物理学、化学的成熟与发展。那时候,解剖刀的使用使西医对人体进入了形下性研究领域。比较而言,中医研究的是人的整体生命层次上的活动着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若是生命停止了,活着的生命的状态也就没有了,那么中医的诊疗也就终止了。而西医研究的人,则要把原形的人打开,首先看到的是人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组织器官,之后才能一步一步地看到人体内的细胞和分子等。在形下性研究人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尽是局部的零件及其功能,而整体生命的人,在解剖刀之下随之完全消失了。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剑桥大学著名的李约瑟先生说过:“西方医学大体在 1900 年初或者最早是在 1850 年前后赶上中国医学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指的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的比较,只是单

纯从医学的临床效果而言,而不是从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而言。按照李约瑟先生的看法,至少在 1900 年之前,西方医学的临床水平与中医相比,要相差很多。

2.1.3 形下性的人与形下性的人的比较 首先,形上之人是活着的、原形的人,是整体的人,是运动着的状态的人;形下之人是在解剖刀、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人体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等。而细胞的活动,完全不能等同于人的生命活动。其次,中医研究的形上性的人,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受精神情志、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影响的;而人的形下性组织器官尽管可以放在手术台上,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但是心脏就是心脏,肝脏就是肝脏,它只是人身的组织器官,而绝非生命的人。

研究形上性的人,即是研究人在活着的前提之下的自我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这个状态是在活着的前提下,自主运动变化着的,即《周易》中“易”之义。《周易》之“易”,核心即是变易,指的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现象及其过程。这是形上与形下对待生命现象的不同看法,也代表了形上和形下两种研究方法在医学领域的根本区别。关于形上和形下两重性的人,《中医复兴论》《医理求真》等著作都有比较具体的阐述。

2.2 证候是中医学的研究对象 这里讲到证候,首先要从文字学的源头上,从证候这一概念的内涵定义上讲起。《中医复兴论》一书中有《證、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一文,是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和中医研究对象的角度,对证候这一概念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的。该文首先从證、证、症、候四个字的沿革、变化与含义上,讨论了当代中医文献中證、证、症、候四个字理解、使用上的严重混乱问题;接着从中医基础理论的源头,即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上,对证候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进行了严谨的表述。这是中西医比较的重点问题之一,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正本清源的重点课题。

关于证候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通过望、闻、问、切所感知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的反应状态。”生命是在活着的过程中的活着的状态。这一状态也是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或者生理之人、社会之人、心理之人的集中表现。一旦人死亡了,生命的过程与状态便消失了,中医所看到的证候也就关闭了、终结了。这里的整体层次,不

是对人体进行解剖之后所见到的人体局部的组织器官及其结构。这里的机体反应状态,指的是有形态、有形体的活人表现于外的状态。这里的状态一词,其中的“状”是空间性的,其中的“态”是时间性的。状态一词若丢失了“态”而只留下“状”,证候一词与症状一词便失去了区别。这一点也是《證、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一文中特别强调的。证候的定义里“生命过程中”一语,是一个关键点。证候是中医学的专用名词,而症状是西医学的专用。中医诊疗倘若离开了“生命过程中”这一前提,便也面临着终结。

中医的证候,与哲学的象、现象,本质上相同。象是哲学中的普遍概念,即哲学研究的对象。《周易》里“天重象”“在天成象”“仰则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等,指的皆是现象。而象或现象,都是在不打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下对自然之物的所见。可以说,一切事物自然而然的,为人感官所知的,皆是象、现象。这些基本特性,与证候是完全一致的。前面提到中医中的证候与哲学中的现象,近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用“片段”和“环节”的比较,有益于人们对对象或现象的理解。从现象中抽出一个片段,恰如从一盘电影胶卷中取出一张胶片,离开了整体,仅从一个片段或一张胶片便看不出运动变化了。而环节则不同。现象中的一个环节,恰如电影胶卷中的一段胶卷,显示的是一件事情中的一部分情节,其首尾是不同的。所以环节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象、事情运动变化的一部分过程。环节是具有时间与空间的两重特性的,而片段却只有空间性而没有时间性。因此,现象、事情运动变化的过程,与证候所反映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的反应状态,本质上是相通的或者一致的。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哲学与中医必然是同一类学科,只不过哲学研究的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现象背后的总规律、大规律,中医研究的只是人的生命运动变化现象背后的小规律、具体规律而已。而西医学里的症状,却只是“片段”而不是“环节”。

在中国的文字里,中医使用的證,一直延续着“左边言右边登”这一个字。从《黄帝内经》时期到《伤寒杂病论》,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医文献里只有“左边言右边登”这一个證字,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人们在表述證候的时候,为了表述简单,常常会出现只说證一个字的情况。另外,《伤寒杂病论》里称脉證,其实是證候的同义词。證字与證候在中医文献里的混乱

现象,出现于 1964 年内地文字改革之后。在当年颁布的《汉字简体字表》之后,简体字的中医文献在表述证与证候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字:一个是“证”,一个是“症”。证与证候,是中医学核心概念,代表着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中医学核心概念的证与证候,在文字学上的巨大变化,这就像不同文字的翻译一样,是值得人们小心谨慎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中医基础理论》里,“证”既指中医的临床表现,也指中医的病理机制。“症”字以往为西医所常用,即症状,但是当《中医基础理论》给“证”赋予了病理机制之内涵后,西医的症状、体征这两个概念,则随之成为中医临床表现的常用概念。“也指中医的病理机制”一语,不禁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哲学里的一句话:“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假如中医的“证”既是临床表现也指病理机制的话,中医临床故有的“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还有存在的余地吗?

2.3 形态结构与功能是西医研究的对象 “医学是关于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这是至今多数辞书中对医学功能的解释,不能算作定义。对于医学面对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形上性的人与形下性的人之外,《中医复兴论》里提到了“七种不同属性”的人: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证候(活的整体状态)属性的人,器官与组织结构的人,细胞属性的人,生物大分子属性的人。以上七种人,都与医学的防病、治病直接相关。

但是从研究对象的意义上看,中医着重研究前四种属性的人,西医着重研究后三种属性的人;用亚里士多德原形与原质的理论来说,中医着重研究的是原形的人,西医着重研究的是关于结构、功能的原质的人。联系到《周易》的理论,前四种属性、原形的人,即形上性的人;后三种结构、功能的人,即形下性的人。前四种人以不拆开原形之人的整体为前提,研究的是生命现象中的证候及与之相关的天、地、人、我诸多方面的关系;后三种人以拆开原形之人的整体为前提,研究的是构成人体内在的原质,即构成人体的器官与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

之所以有后三种属性的人之说,是因为人体这三个层次的结构在整体的环境之中,尚有自我新陈代谢的生命现象存在。倘若从分子层次再往下分,则是原子、元素层次,那就彻底地进入非生命领域了。一

些原子、元素固然可以合成有机的生物大分子,但是大多数原子、元素并非生物。笔者曾经说过:西医是用非生命领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生命领域的医学问题的。它固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医学生命问题,但它不能说明人身整体的复杂现象。这就注定了西医以构成人体的器官与组织、细胞、分子为研究对象,有其必然的局限性。

中医的前四种人西医几乎不懂,西医的后三种人中医几乎无闻。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受中医基础理论的支配;西医的视、诊、叩、听受西医基础理论的支配。中医的证候既含有空间特征,又具有时间特征;而西医的症状、体征里却只重空间性,几乎没有时间性。因此,站在哲学的高度用形上与形下,原形与原质的理论观念来界定中医与西医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应用是最恰当、最准确的。

中医与西医都具有防病、治病的医学价值,但是在人的身上,两者各以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医与西医彼此在骨伤、皮肤外科、耳鼻咽喉等方面疾病的治疗上,有一定的交叉或者相近之处。但是,中医与西医在各自的重点领域,即大内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方面,理论与临床上各成体系,而且互不兼容。这是由于中医与西医研究对象上的本质性、主流性区别所决定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中西医关系时,常常忽视了中西医研究对象上的本质性、主流性区别。有的人甚至将中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为中西医的研究对象,据此断言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为统一的医学理论体系。这一些问题,应当在中西医比较中进一步深刻讨论。

世界上有多少人们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经过努力而形成多少门科学。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句话,同样是我们认识中医与西医的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首要原则。

3 关于中西医研究对象的补充说明

其一,形上形下,人为之最。《黄帝内经》里有不少地方讲到形上人的复杂性,其中,“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儒家学说认为,天、地、人并列为三才,若把天、地理解为自然,则人与自然并列。若要想认识人的形上性,则必须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理性思维属性统统联系起来,才能把人的形上特性理解得透彻。中医临床的辨证

论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这些根本性理论原则。

就形下之人而言,当今西医的生物医学,对于形下的人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20世纪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及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形下性西医沿着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层层深入,进展很快,因而同样没有理由把西医简单化。

其二,生命与非生命。在人的形上与形下两大最复杂的范畴里,需要明辨生命与非生命两种境界。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二元论的笛卡儿有一本书,叫《动物是机器》。后来法国的梅特里也写了一本叫《人是机器》的书。试想,一位老练的汽车修理工可以把汽车拆成一大堆零件,还可以把一大堆零件组合成原来的汽车。但是,若是把一个人的全部组织器官拆开来再组装成一个活人,肯定做不到。倘若人类可以像英国克隆绵羊多莉一样制造出人,今天的中医与西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应当看到,西医的研究对象进入细胞、分子水平的今天,形下性的西医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潮已经走到了自身的终点。此时的中医更必须懂得,人似机器却绝非机器。而能够引领人类生命医学的,正是中医学。

20世纪70年代美国恩格尔先生提出的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发展模式,正是西医生物医学走到了生命极限与研究终点时,一种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的愿望。西医的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者什么时候可以综合为一体,就好像形上与形下合二而一的美梦一样。以哲学为根基的天、地、人为一体的中医学,永远是恩格尔先生望尘莫及的美好愿望。

其三,物之事与物之质。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2]毛泽东在《矛盾论》通篇中,讲的都是“事物”,而不是“物质”。文中有一名句:“事物的运动变化在于事物的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

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实,哲学本身就是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学问,而近代还原性科学则是研究“物质”结构与功能的学问。是列宁或者当年的翻译者把“事物”误以为“物质”了,这不是我们这里细纠的问题。然而,将近代物理学、化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的研究对象彼此颠倒混淆,却是当代中医学领域务必研究和纠正的了。

所谓“物之事”,意在突出事物一词的“事”。因为“事”是原形呈现在人们感观里的运动变化着的象、现象。所谓“物之质”,意在突出物质一词的“质”字,因为“质”在哲学上是构成原形的原质,亦即构成原形的在局部层次上的结构及其功能。这里所称的“物之事”,相当于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也与哲学里的象、现象是同义词。这里所称的“物之质”,相当于西医研究对象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及其功能。这两个概念的厘正,是正确理解中医学研究对象时至关重要的结点,千万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连喜剧作家富兰克和恩斯特也莫能例外。在他们的剧作中有一段台词:“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哟,范式全变了啊!”因为一层蛋壳,隔开了一个生命不可通约性的两种生存范式。这就像一把解剖刀亮出了人类生存的两种模式那样:一种是中医学面对的人在整体水平上的生命现象;一种是西医学面对的解剖刀之下的人体局部水平上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

参考文献

- [1]李致重.实现中医复兴梦的战略步骤与任务[J].中国软科学,2013,28(5):1-9.
- [2]陈红,姜波.对西方“列宁学”批判的批判[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1(1):73-81.

(收稿日期:2022-07-10)

(本文编辑:蒋艺芬)